

并对战争以后的影响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对大陆和台湾军民抗日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达到了东道主提出的“促进学术交流,检讨过去,策励未来”的目的。在讨论中,两岸代表也发现,由于交流不多,双方彼此使用对方的资料较少。因而,学者都有一个共同愿望:进一步加强交流,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大陆和台湾的历史资源。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甲午战争的历史影响·北京

董建中 黎烈军

1994年7月13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市历史学会共同举办了“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六十余名学者与会,发言整理如下。

一、关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原因问题

李侃说: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清政府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战和举棋不定。针对“常熟主战误国”的看法,李侃认为,日本发动战争,志在必得,对清政府来说不存在“和”的问题,“和”就是投降。李鸿章主和,又是军队统帅,将帅失志,何谈胜利?李侃还分析了荣成湾“虚防”一事,引申出当时国民普遍缺乏国防观念问题。李文海认为:不论战与和,战争已不可避免。但对于主战抵抗也应具体分析,主战派中有要求拆铁路、停止使用机

器、电讯者，对之不能简单肯定。

郭毅生认为，此次战争中国可胜可败，当时日本人自己分析胜负之比为四六开。他们也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中日双方在军事实力即“硬件”方面相对持平，有差距但也很小。然而在“软件”方面，包括战略战术、后勤保障、政治体制等等，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如中国实行募兵制，日本实行征兵制即是明证。郭毅生指出：中国军队的腐败不能笼统言之，清军如马玉昆部队是很能打仗的；许多海军将领在战败后自杀殉国，十分壮烈。关于直隶提督叶志超的评价问题，郭毅生指出，战争伊始，叶志超就向清廷提出六点建议，其中就有后继兵力问题，说明叶志超还是比较有战略眼光的；朝鲜战场牙山、成欢等战役，我方处于劣势，叶志超的撤退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清军的实力，这应该给予肯定。

王道成在题为《慈禧与甲午战争》的发言中用大量史料和数据分析指出：慈禧修颐和园共花费五六百万两白银，此举对战争影响不大，光绪十年以后海军没有添炮购船，应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关系去考察。王道成特别强调了甲午慈禧六十寿庆对战争的影响。户部为此筹银五百余万两，慈禧本人视此为压倒一切的大事，而为战争筹款二百五十万两。日本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而发动战争，知道中国人不可能全力应战。慈禧对战争的态度因战争受挫由战转和寄希望于外国的调停。王道成总结指出：已经归政的慈禧太后实际上起了极坏的作用，慈禧反映和代表了清政府的腐败。

潘向明谈到了清政府的战略失误。1885年以后，以防日为主的国防战略逐渐放弃，慈禧寿庆是战略指导思想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战争前夕，推迟战争的发生是可能的，并且是对中国有利的；在撤回牙山军队问题上，李鸿章等上了日本人的当，随之牙山战役揭开了战争的序幕。战争第二阶段，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旅顺口轻易失陷，京津门户洞开，此时战争已不可挽回。

吴建雍上溯历史认为，18世纪清朝是东方最强国，当时并没有丧失海洋意识和国防意识。乾隆时期曾在昆明湖演练水师，后于

道光八年解散。清政府片面强调骑射，失掉了开国之初借鉴吸收红衣大炮的那种开放心胸。中日实力的对比差距在战前就已形成。

李文海认为，甲午战争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极好范例，但对这个结论要做具体分析，落后是综合国力的落后，决不仅指经济的落后，它还包括政治、社会状况，国民素质等诸多因素。

就近年来甲午战争的研究状况及其成果，何瑜从三个方面，即丰岛海战、黄海大战和甲午战争的陆战研究等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了概述。他认为，近年来北京、山东、辽宁等地的学者从世界全局、国际背景的视角研究这场战争，新的成果不断问世，整个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二、关于战争的影响问题

与会者一致认为：历史上没有哪一次重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李侃指出：中国变革基本上是从甲午战后开始的，战争的确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变法由此开始。

龚书铎介绍了战争时期的社会舆论情况。当时《申报》、《万国公报》等载文分析战争的得失，提出过类似“持久战”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当时人针对战争的失败，提出了变法图强的要求，如有人强调人才重要，要求文科、武科考试，并有人提出学西方，立议院的呼声。

刘桂生从近现代思想史着眼分析了战争的影响，认为战争的烽火扩大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视野，中国人找到了日本这一面镜子来反省自己，日本也随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海外基地。在对西学的认识上，由简单的军事层面上升到制度和文化等较深层面。战后学生、知识分子群体日益成长并与旧制度“断奶”，他们肩负起民族文化的更新任务。

杨东梁在《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发言中指出，战争有负

面影响,但同时也刺激了中国,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契机。如甲午战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建设工厂的高潮。民族资产阶级新生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要求变革旧政治制度,学习西方,从康梁到孙中山都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同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里程碑,战后整个民族在意识形态方面不断要求近代化,民族危机以及物竞天择的思想等广为传播,对西方的“民智、民力、民德”思想日益重视,西学开始被全面介绍进来,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现代化的历程。

张振鹏就甲午战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发表看法。他指出,《马关条约》第六款废除了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日本在原则上已享有欧美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日关系经过这场战争由平等关系转变成不平等关系。张振鹏还考察了战争前后日本进攻的三条路线,即经朝鲜到东北、内蒙,由关外向关内的北线;经琉球、台湾、澎湖到福建以至华南华中的南线,以及直入山东的中线,并列举史实说明这三条路线也是以后日本侵略中国的路线。

王晓秋分析了战争对日本的影响,他说:战后中国赔款达到二万万四千万两白银,合三亿六千多万元日元,而日本国民收入是每年八九千万元。当时的日本人就惊喜若狂:“从未见过这么多钱,政府、私人顿觉无比富裕。”这些钱被用来扩军备战,发展钢铁、通讯等基础产业。1897年日本实行金本位制进入国际货币体系,对台湾、朝鲜大加掠夺,其结果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王晓秋指出:战争使日本“暴发”,同时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军部地位上升,左右政治,整个社会思想也充斥着军国主义情绪,这也为日本以后发动战争埋下了种子。

张寄谦指出:甲午战后东亚国际力量发生了变化,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领袖,国际力量的天平向日本倾斜。其后历史发展就是英美等国庇护日本,共同欺压中国。

三、关于甲午战争的遗患问题

日本侵华的甲午战争,对中国的伤害是深重的,它的遗患直到今天尚未完全消除。

王汝丰的发言批驳了日本某些学者和台湾某些人散布什么“中华概念不清楚,中国概念不清楚,中国人概念不清楚”的谬论,指出:他们借口台湾在甲午战争后曾是日本殖民地就鼓噪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日本从1874年以来就制造所谓台湾主权的争议。在努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今天,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弘扬爱国主义,使人们明晓这段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张寄谦指出:甲午战后割让的台湾抗战胜利后中国已收回,但日本统治台湾50年中台湾社会所受的心理毒害,与大陆隔离所产生的文化心理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在今天,更值得我们重视。

彭明谈到战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支援台湾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时指出,刘永福是应该大力宣传的民族英雄。让人们明白战争前后的历史就可以回答台湾当局某些人的“何为台湾”的问题。

吴天颖在会上向各位学者详细介绍了钓鱼岛的情况,指出:钓鱼岛大陆架的石油储量初步探明为800亿桶,相当于一个波斯湾,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但至今未能收回。日本早在1885年就开始觊觎该岛。而《马关条约》关于台湾的割让也写明是“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进行有悖于“搁置原则”的活动。他们为了占有钓鱼岛,就极力宣扬钓鱼岛与《马关条约》中关于割让台湾的条款无关,而求助于国际法中的“无主”、“先占”原则,日本政府对此大力资助。相比之下,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存在着很多“禁区”,存在着很大差距。吴天颖呼吁国家应大力支持边疆史地研究,史学工作者也要担负起时代的重任,否则既对不起前人,也

愧对后世子孙。他最后指出，中日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必须使两国人民了解真实的过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北京

张 炜 方 坤

1994年8月17—18日，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海军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以“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为主题，联合举办的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为会议题词并出席开幕式，刘华清做了重要讲话。研讨会由海军张连忠司令员致开幕词，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等9名同志做了大会发言，军事科学院糜振玉副院长致闭幕词。

这次研讨会重点从甲午海战入手研讨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和作用，从海防理论和海军学术理论的角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参加研讨会的有军内外专家学者50余人，收到论文62篇。兹将学术研讨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 关于甲午海战的历史地位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影响20世纪远东政治局势和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甲午海战作为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政治上产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影响。其一，甲午海战三战皆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给予整个战争的败局以决定性的影响，进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国家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历史灾难。其